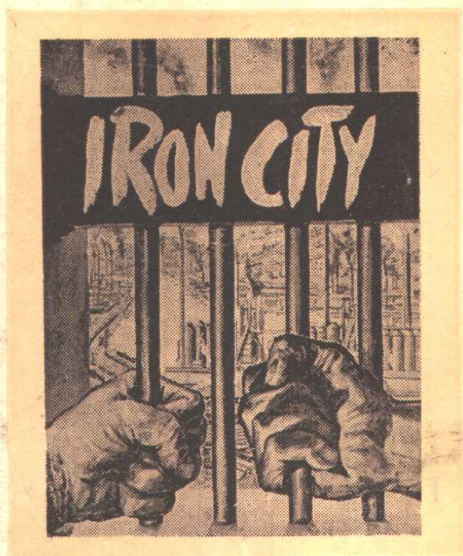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譯叢

鐵城

洛 埃 · 勃 朗 著
鄒 綠 芷 李 蕨 譯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鐵 城

Iron City

原 著 者 Lloyd L. Brown

翻 譯 者 鄒 綠 芷 李 蕓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國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

編號(鐵207)印數00001—12000

類別 文學藝術



Lloyd L. Brown

致中國讀者

『鐵城』——它可能就是匹茲堡，我曾經在那兒工作，我曾經在那兒被工廠主關在牢裏，我也曾經經歷過這一部小說裏所敘述的故事。現在我住在紐約，它也許可以被喚作『金城』。這兒有華爾街，也有獨佔資本家的大銀行和公事房，他們正從『鐵城』裏的勞動人民身上——也從世界上遙遠的殖民地的勞動人民身上吮吸着血汗和財富。

在這裏，同樣地我也生活在鐵柵欄的後面——那是一種無形的種族壓迫的鐵柵欄。從我的窗子，我俯瞰着哈萊謨區——在紐約的這一個黑人居民區裏，大約有三十萬我們的黑人兄弟、姐妹擁擠地生活着。從我的窗子，我也能夠看見沿着寬闊的赫德遜河上的那些華美的房屋，那些自認為是『最優秀的民族』的人們就居住在這兒。除了作為僕役之外，黑人、亞洲人和膚色深黑的人們，都不許居留在這一個區域裏。

我的同種人辛勤地工作着，並且爲着生存而拚命的鬥爭着。可是我們仍然在歌

唱。我們有着出色的古老的歌曲，它們都是從我們三百年來反對奴役和壓迫的鬥爭裏流傳下來的

啊，自由！在我沒有作一個奴隸以前

我寧願被埋葬在我的坟墓裏。

同樣我們也歌唱：

逐漸地，逐漸地，

我將要放下沉重的負擔。……

走，
相信我吧，中國的兄弟姐妹們，我們也將會得到解放。我們將會在大地上行
和你們以及其他國家的兄弟姐妹們手牽着手，在和平與自由之中歡呼。
我愛你們全體。

洛埃·L·勃朗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紐約

作者小傳

洛埃·勃朗(Lloyd I. Brown)現年四十歲，生於美國敏尼蘇答州聖保羅城。他是在該城中的幾個孤兒院裏長大的。本世紀三十年代之初，他作了勞工組織者——曾在楊斯唐組織鋼鐵工人，在新英格蘭組織紡織工人，在新澤西州組織金屬工人。一九三六年，去匹茲堡，參加了組織鋼鐵勞工加入產業職工大會(C.I.O.)的運動。從他在這一地區的鬥爭中，從他成為工人囚犯的生活經歷中，他寫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說——鐵城。二次大戰時，他曾在美空軍黑人聯隊中服役三年。解職後，他加入新羣衆社為職員。目前，勃朗為美綜合性的文化月刊羣衆與主流的副主編。

(綠芷譯)

一個新作者的出現

蘇聯 I·密海伊洛娃

美國黑人文學有二百多年歷史，這些作品，無論是詩、小說、還是評論，都同樣表現出很大的特色。在這些優良的作品中包含着黑人強大的反抗精神、深厚的智慧、幽默、和黑人的詩意般的想像力。幾世紀的殘酷壓迫並沒有把他們毀滅或是叫他們屈服。

在今天，美帝國主義用種族歧視和法西斯恐怖來壓迫一千五百萬黑人的時候，爭取自由和民權的主題就有它更突出的意義。美國的進步力量是團結一致的。福斯特 (William Foster)、戴維斯 (Ben Davis)、但尼斯 (Eugene Dennis) 和杜波伊斯博士 (W. E. B. Du Bois)、法斯特 (Howard Fast) 和羅伯遜 (Paul Robeson) 他們肩並肩的站在一起為爭取和平與民主而鬥爭。同樣，進步的黑人文學和美國進步的文學是有機地合而為一的。

黑人政論家洛埃·勃朗 (Lloyd J. Brown) 在一篇題為『黑人作者應走哪一條路？』的論文中指出反動政府如何想用欺騙的手段使黑人的文學走向抽象頹廢的和

『一般性』(Universality)的『新方向』，而以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使黑人的文學放棄爲人民服務。這種腐朽的世界主義傾向簡直是自投敵人羅網，藉着它，美國的種族主義者意圖摧毀黑人文學，解除它的反抗和仇恨壓迫者的精神。

但今天黑人文學比以前更有其戰鬥任務，洛埃·勃朗分析這任務時寫道：

『廣大的黑人羣衆必須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對於一個黑人作者真正的新方向就是領導他自己的人民，通過他們，並與他們在一起來實現真正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精神現在已經傳遍全世界了。』

這種思想在勃朗的小說，那描寫黑人爭取自由運動的鐵城中生動的表現了出來。

勃朗的小說並不是述說什麼顯著的人物，他書中的人物就是人們所謂的一般的爭取民主的『普通人民』；但在他們的性格裏我們卻發現他們與美國最傑出的進步領袖有極親切相似之處，有同樣的對人民的果敢的無限忠誠，同樣的堅決意志和決心，同樣對妥協深痛憎惡，真摯的人道主義和對祖國深沉的熱愛。

這本小說描寫的時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就在那時，美國壟斷家已經用全力來粉碎民主的力量了。雖然時隔十年，勃朗的小說還是和今天的情況完全能聯系起來的。

書中的主要人物是三個黑人共產黨員保羅·赫波爾，伊薩克·查克利和亨利。

富爾康 他們是在前一年秋天和其他二十三個黑人和白人同志一起被捕的，他們被判決了長期徒刑。他們三人年齡不同，性格不同，彼此的生活也不同。每個人加入共產黨的情形也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工人，都親身嘗受了『美國民主』的恩惠，在遇到了共產黨後，每個人面前就展開了一個鬥爭的和國際友誼的新世界。

赫波爾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是在十八歲那年，他從工廠回到家裏時看見了一副居民被逐的情景。離他家不遠，有三個失業人家被趕了出來，在人行道上堆滿了他們的東西，但是他們並不忍受驅逐，有幾個年輕的人正在把傢俱搬回去。赫波爾就去幫助他們，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遇到了共產黨。

查克利是從密蘇里來的一個中年鐵路工人，從小就渴望開駛火車，做一個火車司機，他是一個優秀的工人，結實而可靠。但是在鐵路上，一個黑人所能實現的最大願望就是做一個火夫，即使他透露出口風，想要開駛火車都要『遭麻煩』的。一九三〇年間年經濟大恐慌到來時，黑人就第一批被解職，沒有開除的黑人就成了三K黨鎗擊的目標。查克利也遭遇到鎗擊，後來他康復了，但是已經沒有工作了，鐵路上海沒有他的工作，別的地方也沒有他的工作。他就向北去，到他哥哥住的一個靠近鐵城的市鎮去，他想法在那邊的白鐵廠找到了事。這些年來他想做一個火夫的夢想遭到了挫折，接着是遭到了慘痛的經驗，他就問自己：難道黑人永遠不能和白人平

等，成爲兄弟嗎？難道沒有辦法實現這個理想嗎？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時，一張傳單塞在他家的門縫裏，上面是一張白人和黑人，以前的鐵路工人福斯特和佛特站在一起的相片，他們是共產黨所提出的總統和副總統的候選人，就像照片上那樣比肩並立的樣子，他們也是在肩並着肩爲一個沒有失業，沒有鎗殺，沒有歧視黑人的國家而工作着，在那個國家裏每個人都能挑選他自己最喜歡的職業，不再像查克利那樣無從如願了。從那一天起，查克利和他的妻子安妮·梅就開始了一個新的生命。

富爾康六十歲，是三人中年紀最長的。他不是一個產業工人，而是一個在鐵城頭等旅館中做了近四十年馬車夫的兒子。亨利在未滿二十歲前就在那裏工作。當了十年廚房助手後，就被提升爲侍者。有一個長時期，他就跟這些僕役中的佼佼者混在一起。但旅館的工作，並沒有使他成爲一個阿諛上司的人，相反的，卻給予了他一種永遠厭惡『上等人』的感覺。他第一次與共產黨接觸是在拯救斯高茨保洛運動中發生的。他自己也覺得非常驚奇，在運動中他竟是一個優秀的推動運動的組織者。實在講起來，他在未加入共產黨以前已經開始了黨的工作。

故事的開始是在獄中，鐵城獄中的過道和圍場上——一個較小的鐵城。資本家們把他們的政治敵人都禁閉在那裏，還有在司法機器下面的命運的犧牲者，以及那

些爲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而又無力收買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的真正罪犯。

戶外活動時，三個共產黨員遇到了隆尼，一個年輕的黑人，被誣告謀殺而被判決死刑。就像對付威利·麥基（Wille McGee）和瑪丁斯維爾七人（Martinsville Seven）一樣，這種法律的私刑迫害引起全世界的義憤。勃朗所寫的隆尼，是一個失業的鋼鐵工人，他是城市裏的法西斯頭子進行脅迫黑人，企圖粉碎他們的人權鬥爭，挑撥黑人和白人工人之間的仇恨行動中的犧牲者。他們的誣告也是人所熟知的老一套：沒有起訴就先逮捕，十六天的私刑迫供：屈打成招，半瘋狂的『見證人』的對證，由法庭指定的『辯護律師』的審訊把戲，一個白人陪審團的『犯罪』的判決書。——於是因爲警察局裏一件『未定案』的謀殺案件，隆尼便被判處了死刑。可是他並沒有柔順地屈服：在法庭和牢獄中他都奮力地爲生命而鬥爭着。

赫波爾，富爾康，查克利都相信隆尼是無罪的，最初他們想不出辦法幫助他：發起辯護運動是一件重大的工作，所有的領袖都被關入牢內，外面的同志如何能配合這事呢？但他們並不就此放棄，事情一定得想辦法。赫波爾經過了深思熟慮後，對富爾康說：『難道我們不可以再來領導麼？難道說我們不是第一牢房丁字監的共產黨嗎？對啦，你和我，當查克從暗牢裏出來的時候，還有他。事情當然並不容易，可是這種事情我們一定要幹。我們一定要來幹，亨利。你，我，還有查克就要

首先來担任隆尼·詹姆士保衛委員會的三個委員！』

赫波爾就用委員會的名義寫了一封呼籲書並給他妻子寫了一封計劃行動的信。獄中的一個人幫助他把這封信逃過監獄的檢查送出去。陷害隆尼的事就傳佈出來。爲他辯護的大運動開始了。他的生命也許可以得救。

勃朗的小說特別使人感覺真實，因爲他沒有虛飾的圓滿結局。關在牢內的共產黨員沒有理由希望減輕自己的惡運。長期的徒刑和非人的虐待擺在他們的面前。隆尼的命運也沒有得到解決，最高法院雖然被迫再考慮他的上訴，但結果到底如何不得而知。敵人是頑強的，但是勃朗的人物完全確信他們偉大的真理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他們的信心感染了讀者。一天晚上，富爾康在獄中做了一個富於詩意的幻夢，他夢見了未來的解放了的人民的歡樂的情景，預報着進步和自由的力量不久就要打垮反動的黑暗勢力了。

合上了書，我們就會產生共產黨已經獲得了勝利的真實感覺，這不僅是因爲他們用機智來戰勝獄牢的警衛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和密探，比這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勝利；敵人的鐵牢在共產黨人的不屈的精神和意志面前變得一點都不中用。在獄中，他們也仍然是黨的一部分——人民的領袖——繼續爲爭取民主而鬥爭，並使和他們接近的人也參加進去。

其中一個，就是隆尼，他逐漸地和痛苦地克服了他那無望的和孤單的感覺，在監獄的牧師勸他拒絕共產黨的援助時，他喊道：『不要對我說這些話，我知道有些人想要謀害我，而有些人在設法拯救我。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陷害我，但我已經開始明白，而我懂得越多，我就越恨他們，另外一種人呢，他們做得越多，我就越愛他們！』

其次是斯里謨·蓋塞，一個囚犯，他冒了極大的危險把赫波爾的信秘密送出去。他所以肯這樣做是因為共產黨的道德和勇敢影響了他。第三個是同監的叫『老總』的人，在他跟查克的友誼中他的人性尊嚴初次被喚醒了。

勃朗小說中的共產黨員是真正人性的。他們的共產主義就是他們整個人生的一部分，並不是他們所要宣佈的什麼高調。年輕的組織家赫波爾熱愛書籍，熱愛知識，有時不免急躁，沉不住氣，在他嚴肅的外表下顯出了年輕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

查克是一個安靜，慎言，充滿了正義和自制力的人，常常夢想有一天他將駕駛一列『光榮列車』在大地上。這人不得不引起我們對他的感情和尊敬。同時我們也忘不了一個談諧的，熱心的富爾康，他的狡猾的幽默感是沒有枯歇的時候的。總之，幽默，溫文，和諷刺穿插在勃朗全部的小說中，像他在故事中編插了民謠的主題，顯然地作者的願望是要把他們人民的民族風格表現出來——正如勞森對這小說的評

介所加的標題，他們是『約翰·亨利的人民』——他是民歌，民謠中人們熱愛的黑人工人。

讀了勃朗的小說可以使人感覺到在『小鐵城』中所發生的事是與外面廣大的世界有着聯繫，它是通過了報上的新聞和赫波爾的妻子的信使人感覺到的。但是我們還希望作者能更廣泛地把外面世界的黑人白人團結一致，反抗反動勢力的事情顯示出來。此外，勃朗所挑選的人物中也有二處是可批評的，譬如像瘋子彼德森，他是隆尼的鄰居和朋友，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他始終和隆尼在一起。但這就不容易使人明白為什麼在勃朗的健康的小說中要放進這個屬於小資產階級小說中的精神病型的謀殺者。

但這不過是次要的缺點，它並不影響這本小說重大的進步意義，像羅伯遜所寫的：『這本書給人以力量，希望和昂揚的意志。它是深深地以黑人人民生活為根據……』

作為記述今天的民主美國運動中的人物事件的小說，鐵城是一個卓越的貢獻——這種類型的小說是比較新的，但它卻在發展着，在美國人民文學中佔有着日趨重要的地位。

關於洛埃·勃朗的『鐵城』

美 J·H·勞森

(原名：『約翰·亨利的人民』)

在羣衆與主流最近所刊載的一篇出色的論文裏，洛埃·勃朗曾經寫着這樣的一句話：『黑人作品的形式與主題主要地是被黑人以外的力量所規定了的。』他的小說就是黑人作品這一趨向的強有力的說明。這裏，最後，終於出現了一本黑人生活的小說，而這小說是和它的主題的偉大意義相稱的。

如果我們用慣例的稱讚的字句來歡迎鐵城的出版，那彷彿是極其簡單的事。你可以說這本小說是『重要的』，『有力的』，『詩意的』，和『真實』的。這一些習慣的形容詞由於商業上的使用已經變爲濫調了。但是這本書的出版卻並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作爲有着重大文化意義的一件事，而且標誌着美國文學的新的意義與新的力量的出現，這本小說便需要着人們對於它的明智的認識。

洛埃·勃朗所寫的是一些在一座陰鬱的郡監獄裏的黑人囚犯。但是這故事卻有

着超乎尋常的範圍，強度和闊度。故事把我們帶到牢牆的外面去，它也把我們帶到當代小說被局限了的領域以外去。它使我們又體會了作爲『創作的歷史家』的小說作家底真正作用。這一點曾經是十九世紀文學大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左拉等人所規定了的關於小說的經典的觀念。這些作家曾經看見人民在歷史的潮流與活動中進行鬥爭，他們曾經在社會關係的描寫中探索了個人的命運，而那種社會關係是決定着每一個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

因爲小說本身在完成着歷史的作用，因此任何重要的小說創作便必需被放慮到它的歷史背景，它在它的時代裏的社會鬥爭與文化鬥爭中的地位。鐵城的出現是在美國最成功的小說家彷彿已經放棄了傳統意義的時候。（或者說，如果的確他們也有什麼意義的話！）諾曼·梅勒正在所謂托洛茨基「藝術」的淫虐主義與顛倒黑白的泥淖中打滾。詹姆士·瓊斯，最近美國小說界的令人暫時感到奇異的作者，曾經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主要的是以它對於人類的憎恨，它的虛無主義和它的不可慰藉的殘酷而著名的。必需承認，梅勒和瓊斯在企圖完成一個歷史任務；但是他們卻只是烏七八糟的歷史家。

在最近出版一本關於文學批評的論文裏，J·W·阿爾德里治曾經說青年作家們『已經承繼了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批評，像是人生意義的消失和一個藝術社

會的缺乏一樣，只不過是整個時代的一般衰敗的徵兆。自從戰後，在世界上所有的區域裏，便有着一種創作活力與創作衝動逐漸減弱的情形。」

這最後的一句話暴露了批評家的觀點的局限性和他的悲觀主義的根源。像他所談到的那些作家一樣，阿爾德里治已經「承繼了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但是這一個世界卻並不包括那一片人民與文化完全結合的青蔥的土地。同時也並非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區域裏」都出現着創作力的減弱。相反地那只是存在於華爾街所統治與影響下的國家裏的現象。在這些地區裏，對於「毫無意義」的說法的崇奉——也就是對於人類進步的命運的否認——是被有計劃地鼓勵着，來作為擁護戰爭的辯解的。作為原子毀滅對象的文化與人民顯然是毫無意義的。在屬於社會主義的許多國家裏，卻並不否認意義，在那裏，在藝術與思想範圍內，每一件屬於真理的事物都被珍愛地看作人民的不可讓渡的財產，並且被用來建設一個自由的社會。

這個背景對於洛埃·勃朗的小說的評價是有密切關係的，而且是非常首要的。因為它響亮地肯定了那些「意義」——那些人類道德、合理生活，與同志愛的傳統意義，依照今天的鬥爭的條件他們更被賦予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意義。當全部的人道主義的傳統被否定的時候，當國會委員會使一些藝術家與作家因為「危險思想」而遭受審訊的時候，當美國最高法院規定了擁護某種思想、使用某種禁書為非法的時